

The Economic Interpretation of China's "Third Migration Wave"—Based on the Basic Views of the Classics of the Three Eras of Adam Smith, Marx and Commons

Hongchao Wang¹ Yuantai Xie^{2*}

1. Jinling Huaxin Investment Management Co., Ltd., Beijing, 100020, 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Trade, Jiangx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anchang, Jiangxi, 330045, China

Abstract

Using the basic viewpoint of three classic works of different eras to make an economic interpretation of China's "third migration wave" can gain valuable inspiration. First of all, the use of Adam Smith's *The Theory of national wealth* of the cost of population flow: the current division of labor and cooperation has been arranged in the world-wide industrial chain, the need to economic analysis and research context into a global scope. Attracted by the increasingly liberalized immigration policy in foreign countries, the high-quality talents needed for china's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re increasingly lost, ordinary workers bear huge cost of living, consumption is shrinking, social contradictions will also be hidden. Then the use of Marx's *Capital* of the capital organic composition of the theory of interpretation: developed countries through flexible and relaxed immigration policy to attract the world, especially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young talents for its use. It not only reflects the trend of increasing the organic composition of capital in capitalist countries, but also makes it difficult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to extricate themselves from the unequal division of labor. With the disappearance of the Chinese and mouth dividends, the early arrival of the aging society will make our country's social security system face greater pressure. Finally, the interpretation of conflict of interest and efficiency in Commons'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is interpreted: the emergence of the migration tide is the concentrated embodiment of the conflict of interest between different groups, and this conflict is due to the backwardness or lack of system. Therefore, the government's urgent task should speed up the construction of economic efficiency system.

Keywords

the third migration wave; economic interpretation; Adam Smith; Marx; Commons

对中国“第三次移民潮”的经济学解读——基于亚当·斯密、马克思和康芒斯三个时代经典著作的基本观点

王洪超¹ 谢元态^{2*}

1. 金陵华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北京 100020

2. 江西农业大学经济贸易学院, 中国·江西南昌 330045

摘要

运用三个不同时代经典著作的基本观点对中国“第三次移民潮”作经济学解读,能获得有价值的启发。首先运用亚当·斯密《国富论》中的人口流动成本理论解读:当前的分工协作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安排产业链,需要将经济分析研究语境转变为全球范围。在外国日渐放开的移民政策的吸引下,中国经济转型所需要的高素质人才日渐流失,普通劳动者承受着巨大的生活成本,消费日益萎缩,社会矛盾也会潜滋暗长。然后运用马克思《资本论》中的资本有机构成理论解读:发达国家通过灵活宽松的移民政策来吸引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青年才俊为其所用。既反映了资本主义国家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的趋势,也令发展中国家陷于不平等的分工格局中难以自拔。随着中国人口红利的消失,老龄社会的提前到来,将使中国的社会保障体制面临更大的压力。最后运用康芒斯《制度经济学》中的利益冲突与效率观解读:移民潮的出现是不同集体之间利益冲突的集中体现,而这种冲突皆源于制度的落后或者缺失。因此,政府当务之急是应该加快富有经济效率的制度建设。

关键词

第三次移民潮; 经济学解读; 亚当·斯密; 马克思; 康芒斯

1 引言

时下,报章热议中国近年形成的移民趋势,引发了对“第三次移民潮”的争论。主要观点认为当前的移民浪潮不仅绝对人数比以往大大增加,而且呈现“高学历、高技术、高成本”等特点,并以中国社科院《2007:全球政治与安全》提出的“中国在成为世界上最大移民输出国的同时,中国流失的精英数量也居世界之首”为佐证,认为作为移民潮主力军的中国新富阶层和知识精英将导致中国资本和人才的大量流失。也有专家学者对此不以为然,认为勿须大惊小怪。

人口自由流动、迁徙现象本身就是对当今全球化深度发展的很好的体现,因为人口流动往往伴随着资金、信息、商品的同步流动,最终能实现资源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最优配置。对每个参与到全球化分工中的国家而言,在经济方面、劳动力方面的竞争非常激烈,全球化的“双刃剑”功能起着重大作用。作者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理解中国此次“移民潮”背后的经济驱动,是把握问题实质、进行有效应对的关键所在。因此,论文尝试基于亚当·斯密、马克思以及康芒斯的经典论述来对这一问题进行解读。

2 以《国富论》人口流动成本理论解读

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派推崇通过人口的自由流动来实现劳动的最有效配置。在《国富论》中,斯密将分工看作财富的起点或源泉,认为“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改良以及在任何处指导劳动或应用劳动时所用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的大部分,都是分工的结果”。当前的分工协作已经不再局限于一国范围内,在全世界范围内安排产业链也已成为公认的双赢模式。因此,斯密的分工观点仍然不过时,只是我们需要将经济分析研究范围由一国之内、地区之间转变为全球范围、国与国之间。

虽然斯密并未对人口经济现象进行过专门的论述,但其基于分工的论述还是给了我们关于人口流动成本以很大的启

【作者简介】王洪超(1979-),男,中国山东威海人,江西农业大学政治经济学专业硕士,(北京)金陵华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投资总监。

谢元杰*(1955-),男,中国江西上犹人,江西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经济学教授,全国财经院校《资本论》研究会常务理事,从事《资本论》与转型经济研究。

发。他认为,“人性见异思迁,虽早有定论,但根据我们的经验,人类却又是安土重迁,最不易移动的。劳动贫民,如果在劳动价格最低廉的地方,尚能维持家属,那在工资最高的地方,就一定得过相当优渥的生活。”从中我们可以理解触发人口从一国(或地区)流动到另一国(或地区)的关键因素,应该不是高收入,而应是高生活成本。这里的“高生活成本”应该是一个主观性、相对性、长期性的概念。

以住房成本为例,中国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2010年5月20日发布报告称,2009年中国房价收入比达8.03,创历史新高,京、沪、深、杭四地纯商品住宅的房价收入比均超过14^[1];相比之下,金融危机前的2006年,美国房价收入比仅为3^[2]。在社会保障、医疗保险、教育公平等方面中国与世界的差距也非常大。单从最明显的方面来看,中国的生活成本已经如此之高,似乎与发展中中国的定位不相称。除此之外,竞争压力、法律保护、民主制度等许多软性指标都会加重中国人民对高生活成本的痛苦感受。但直接受限于移民目标国的移民政策,有资格选择移民他国的只是那些有资金或者有技术的高端人士。例如,金融危机后的美国已开始推行的EB-5类签证,其设定的申请美国绿卡资格的投资门槛是最低50万美元(约人民币345万)。另根据北京因私出境中介机构协会的最新统计数据,到美国投资移民的EB-5类签证的中国申报人数已经从2008年的500人上升到2009年超过1000人^[3]。其实成功移民并不代表一劳永逸,他们同样需要不同程度地面对与本土文化纽带割裂带来的阵痛,还要为努力融入当地社会而付出巨大代价。

高昂的生活成本将会给中国带来什么呢?一方面,在其他国家日渐开放的移民政策的吸引下,中国经济转型所需要的高素质人才日渐流失。缺乏必要的高端劳动力资源,中国战略从何谈起?另一方面,普通劳动者承受着巨大的生活成本,消费日益萎缩,社会矛盾也在潜滋暗长。长此以往,难免出现社会动荡、经济萧条的局面,这是中国政府必须高度重视的问题。

3 以《资本论》资本有机构成理论解读

21世纪是知识经济的时代,而要获得这个时代的话语权,高技术人才无疑是关键因素。在这方面,中国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自由民主的氛围、良好的教育条件和理念、富足的物质生活等,通过灵活宽松的移民政策来吸引世界各国青

年才俊为其所用。这种对人才的吸引力，反映了中国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的趋势。

马克思在《资本论》对此论述道：“资本的增长包含它的可变组成部分，即转变为劳动力的组成部分的增长。假定资本的构成不变，同时其他情况也不变，那么，对劳动的需要和工人的生存基金，显然按照资本增长的比例而增长，而且资本增长得越快，它们也增长得越快”。结合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我们更应该看到，每次经济危机往往伴随着技术的革新，而技术革新有助于形成新的产业、新的需求、新的就业机会。换言之，科学技术的提高决定了资本的构成及资本价值的增长率。同时，技术革新会使某些产业成为夕阳产业，出现“失业大军”，即马克思所讲的劳动力相对过剩的现象。

据报道，近十年中国申请各国技术移民与投资移民的数量之比约为 20 : 1。具体来说，相当于每天都有近 60 名教育背景良好、工作体面、收入颇丰的中国中产精英同时向加拿大移民局递交移民申请。这样的局面无疑令后金融危机时代的中国谋求经济转型面临着更大的人才缺口。长期以来，中国依靠廉价、低附加值的劳动来创造外需，以拉动 GDP 的快速增长。因此，从人均创造 GDP 的角度来衡量的话，上述吸引世界优秀人才的做法会令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陷于这种不平等的分工格局中难以自拔。更为严重的是，随着中国人口红利的消失、老龄社会的提前到来，目前已杯水车薪的社会保障体制面临着更大的压力。

金融危机给各国带来机遇的同时，当然是避免不了阵痛的。解决失业问题一直是发达国家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因此解决摩擦性失业和非自愿失业也是令各国政府挠头的问题。毕竟在成熟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资金总是投向收益高的朝阳产业。通过放松投资移民的限制条件，吸引大量世界资金，的确是一举多得的妙招。以加拿大移民为例，该国移民局数据显示，2009 年加国投资移民全球目标人数为 2055 人，中国大陆占了 1000 名左右。以投资“门槛标准”40 万加元（约 235 万人民币）计算，全年从中国流向加拿大的财富至少 23.5 亿元人民币，等于再造一座世博会中国馆。这样的数字不得不引起我们的关注。这种趋势将会不断消耗中国的外汇储备，也可能成为国际热钱流入中国的灰色通道，加大中国政府外汇管理的难度。

4 以《制度经济学》利益冲突与效率观解读

制度经济学将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研究视角由物质产品层次引入到法律制度层次，将市场条件下的交易行为定义为一种所有权转移的过程。康芒斯的《制度经济学》是制度经济学派的第一部系统性的理论著作，他还同时出版了一部《集体行动经济学》是对《制度经济学》的进一步解释。他的基本观点是“利益冲突在交易关系中占据了突出地位”，但“还有相互依赖性以及通过集体行动维持秩序这两方面的问题”；“和谐不是经济学的假定前提，它是集体行动的后果”，这种集体行动能实现将效率作为普遍的原则，克服资源的稀缺性^[4]。

根据相关报道，可以将近期移民潮的移民理由总结为几点：（1）持他国护照的便利性；（2）更完善的社会保障；（3）相对公平的法律制度；（4）宽松自由的生活工作环境；（5）空气质量、食品安全、教育水平更令人安心、满意等。归结到一点，完善的制度是移民潮形成的根本原因^[5]。

完善的法律制度是现代社会的正常运转的制度性基础。公平的法律制度缺失，会造成个人权利得不到保障，缺乏生存安全感。两千年的封建社会造就了中国政治文化“人治”多于“法治”、权大于法的痼疾沉疴。中国法制建设虽然在不断完善中，但现实中人情、关系大行其道，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体现了当下法律制度确实存在诟病。从中国重庆打黑行动看出，警察与黑社会勾结，已经严重损害了警察作为“社会正义化身”^[6]的形象。权力寻租、贪污腐败比比皆是，暴力拆迁、冤假错案屡见不鲜。伴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日益普及，群众对信息的共享很容易形成强大的社会影响力，地方政府与群众之间基于利益冲突形成紧张状态，政府的公信力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着眼于此，中央政府提出“和谐社会”的理念。作者认为，只有解决执法必严，强化法律公平与正义，才能实现真正的“和谐”^[7]。

健康、理性的经济环境同样需要制度到位。经过三十年来的改革开放，中国在市场经济培育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商业伦理、信用的商业文化制度还未真正形成。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政府在市场经济中扮演什么角色的问题，出于利益驱动，官商勾结、权力寻租等问题导致中国经济成本高昂、效率低下，社会福利损失严重。面对保护主义的户籍制度、土地财政造就的高房价等局面，“逃离北上广”在成为年轻

人的口号和行动方向的同时,移民又何尝不是一个理性的选择。出于政治前途考虑,地方政府只关注GDP政绩^[8],对环境污染、食品安全等公共问题视若无睹,迁移到具有安全保障的国家,同样可以理解。

制度并不总是白纸黑字,文化传统、行为习惯同样也是另一种形式的制度。在经济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在文化上感受着现代与传统的冲突,我们要的是现代气派的高楼大厦,推倒的是传统灰色的四合院;我们要的是时尚流行的西方文化,抛弃的是传统沉重的中国文化。在对待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上,应该承认中国人的传统文化习惯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但也有很多值得传承的文化精髓。可喜的是,一方面中国元素正越来越得到中国公民的认可,也在国际舞台上独树一帜;另一方面,某些传统陋习不但没有被取代,反而发扬光大。请客送礼、酒桌公关、潜规则等现象,折射出来的是不健康、不公平的竞争氛围,同样与追求个性、自由的现代文化是相悖的,也常常会令身处其中者不堪其扰。因此,移民发达国家,也是追求现代、健康的一种生活方式。

从上述分析中能看出,移民潮的出现是不同集体之间利益冲突的集中体现,而这种冲突皆源于制度的落后或者缺失。当国民看不到趋势转向的希望时,选择移民是合情合理的。作为政府,当务之急不是陶醉于已经取得的经济成就,而应该是思考如何加强对经济制度的建设,以保持经济继续增长,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正如有人这样评价,中国改革开放可以用十年取得西方一百年的经济成就,但却不可能取得西方一百年的制度成果。我们高兴地看到,2013年11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三中全会把“中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确定为中国共产党的重大战略任务,为了解决中国“移民潮”的负面影响将逐步纳入刚性的法制规范中。

5 结语

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看,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最关键的因素。但是人的脑力和体力的发挥却是需要客观条件的,制度是不可或缺的客观因素。只有完善、公平、健康的制度,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能动性和创造力。“第三次移民潮”的出现,客观上肯定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同时也揭示了改革开放仍面临着许多内在问题,因此中国在这方面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参考文献

- [1] 唐云,冯江平,李媛媛. “第三次移民潮”的“来龙”与“去脉”[J]. 商,2015(14):78-79.
- [2] 黄宇,苏以荣,王克林,等. 肯福环境移民示范区自然资源现状及其开发利用研究初探[J]. 河北省科学院学报,2000(04):243-248.
- [3] 孙来斌. 解析利益冲突,促进制度创新——评《利益冲突与制度变迁》[J].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05):719-720.
- [4] [美]康芒斯. 制度经济学(上)[M].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
- [5] [美]康芒斯. 制度经济学[M]. 于树生,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
- [6] [美]康芒斯. 集体行动经济学[M]. 于树生,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
- [7] 马克思. 资本论[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 [8] 亚当·斯密.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M]. 唐日松,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2014.